

# 罗仁地(Randy J. LaPolla)访谈录

本刊编辑部

时 间:2007年11月4日下午

地 点:中央民族大学

被访者:罗仁地:澳大利亚拉筹伯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语言学系系主任、语言类型学研究中心主任、澳洲语言学协会会长、国际双语协会副主席、中央民族大学“长江学者”。《藏缅语区语言学》(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学术期刊)主编。著作包括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藏缅语系语言》)、A Grammar of Qiang (《羌语语法》)、Syntax: Structure, Meaning, and Function (《句法:结构、意思和功能》)。

采访者:《汉藏语学报》编辑部成员(按音序排)蒋颖、胡素华、罗自群、田静、汪锋等。访谈会由编辑部主任罗自群主持。

内 容:罗仁地先生根据采访者的提问,讲述了他的学术道路以及在原始汉藏语的构拟、参考语法、濒危语言、田野调查、藏缅语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等方面的一些见解。

## 一 学术道路

蒋 颖:您已经在藏缅语研究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请问您是怎么走上藏缅语研究的道路的?藏缅语研究中,最吸引您的地方是哪些?

罗仁地:我当年走上藏缅语研究的道路纯属巧合。我最早是学哲学的,看了很多中国古代与哲学有关的著作,但当时由于不懂汉语,所以看的都是英译本。但那些译本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不太令人满意。为了更好地了解原文的意义,我看了许多不同的译本,例如先秦的《道德经》,我曾看过好几部不同版本的译文。当时就想,如果能够直接看汉语原文那就更好。当时大学没有汉语课程,但是1975年,“中美人民友好协会”给我提供了一个学汉语的机会。在学习过程中我发现汉语的句法结构和相关用法都很有意思,加上协会在活动中介绍了中国

的种种情况,引起我对新中国的好奇,因此就想到中国去看看。1976年春天协会给了我访问中国的机会。回美国后,又想再到中国去住一段时间。当时只有英语外教可以长期住在中国,于是,我就在美国读了一个英语教学的硕士学位,在修读硕士的过程中就迷上了语言学。

1981年我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当时没有单独给外国人上的课,我们跟中国同学一起上课。因为我已经有硕士学位,而且北大当时还没恢复博士学位,所以我就在中文系当汉语专业的进修生。第二年戴庆厦、陈其光等老师到北大开了一门“汉藏语概论”。我对汉语以外的汉藏语的兴趣就是听了他们在北大的讲座之后产生的。在讲座上以及此后的阅读、研究中,我发现汉藏语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回美国后,我到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念博士,本来还是想研究汉语,可是后来有机会听马提索夫教授的课,听了他主讲的有关东南亚语言和藏缅语的两门课,从此就走上了藏缅语研究的道路。在此后的研究中,中国以及亚洲的文化、历史都深深吸引着我。我认为学习一种语言同时也会学到这种语言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例如古汉语时期的思维方式、语言结构、文化等都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相差甚远。另外,学一种思维方式可以让人的思路更开阔,视野更宽广。

蒋颖:罗先生,你做过李方桂先生的专访,与李先生有多次接触,能介绍一些情况吗?

罗仁地:当时我每个星期都准备一些问题,然后去李先生家问他,这样连续做了几个月,我个人的收获很大,除了具体的语言学知识以外,我还有机会了解李先生的研究方法、做人的态度。他一方面很客气;一方面很有幽默感。他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损别人,他做他的,别人做别人的,他用科学的方法来做学问,也不批评别人,所以我觉得他为人和做学问的方法特别好。还记得我问过李先生好几次他对汉台语关系的看法,他每次都说,有人这么认为,有人那么认为。我问了他好几次他的个人意见,他都不表态。大概六七次后,我跟他说,“李老师,您一定要表态,因为很多人想知道您的看法”。李先生想了会儿,然后说,“噢,这个问题不重要”。他根本就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因为他认为我们现在对这两个语言的了解不够深,对汉族的了解也不够深,如果两方面的工作做好了,我们对这两个语言有了更深的了解,那么两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就会很清楚,不会有什么争议了。所以,他的意思是,我们最好暂时不要讨论这些关系,更不要提起什么更遥远的关系。我认为,他对某个问题还不能确定的话,就不会随便下定论。因为他做学问很小心,只要有所怀疑,就不愿意表态。他就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他认为我们要先去做低层次的工作,那样就比较踏实,比较科学。

## 二 原始汉藏语的构拟

田 静:一直以来,汉藏语的系属问题都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热点。在原始汉藏语的构拟问题上,远程构拟和近程构拟是两种主要方法。请谈谈您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罗仁地:像白保罗他们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做远程构拟的时候,当时没有几部比较完整的语言描写,语料也不多,因此只能选择几个记录得比较好的语言来做初步的比较。他们那个时候用那个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现在我们资料很多,也比较好,所以最好从比较小、底层的范围开始,一层一层地构拟上去。我觉得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做那种远程的构拟。这也是李方桂先生的意思。他说,我们还是先把底层范围的情况了解清楚了,再一步一步地上去,才是比较可靠、科学的做法。现在我们的条件允许我们这么做。

汪 锋:声调尽管是后来产生的,但在声调产生之前是不是一定会有前面的音段条件呢?如果比较现在的声调类,是不是反映了以前声母、韵母或超音段的特征?

罗仁地:一般是这样,但有时候很难找到影响声调的条件,有时候根本找不到。很多声调系统分阴阳,是因为原来声母有清浊的对立。因此,你在构拟的时候,要构拟清浊的对立,但这已不再是声调的构拟了。我在1992年写的一篇文章里谈到,在语音、语法上,如果你看得出某种现象的来源,那就不要构拟那个现象,只要构拟产生那个现象的条件。因为你既然看得出它的来源,那就说明它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后起的。像印欧语系语言研究中,学者之所以构拟一些形态标志,比如名词的阴性、阳性,就是因为看不出这些标志的来源。如果你看得出来,比如,藏缅语的一些语言中的动词人称标志,我们看得出它是从代词演变而来的,那就不用构拟了。语音也是一样的。如果你一步一步上去,就会知道什么现象是什么时候产生的,什么是新出现的,什么是原来就有的。所以,我还是觉得近程构拟的方式比较可靠。

萨丕尔早在1923年的*Language*的第八章中就提出了“漂流”(drift)的概念。他说,有共同来源、有亲属关系的语言,比如德语和英语,都可能会经过很多类似的发展、演变过程。藏缅语族语言中的很多特征也是这种平行发展(parallel development)的现象,比如格标志、存在动词的分法、人称标志。如果你对藏缅语很熟悉的话,你都能猜得出来一个语言可能会有某些特征。我在1994年的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这些现象,文章中指出,虽然有些语言的特征相

同,而这些特征的结构也相同,但所用的语素来源不同,所以,这些语言只是类型学上的相似,结构都是后起的独立创新。正如单音节的语言很容易产生声调一样。

### 三、参考语法

田一静:您与黄成龙合作撰写的《羌语参考语法》已经出版了。这本书已成为参考语法研究的重要参考。请您谈谈参考语法与国内传统的语法描写有哪些区别?在进行参考语法写作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罗仁地:这本书是我写的第一部参考语法,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它不是完美无瑕的,也有很多问题。我现在正在做日旺语的参考语法,希望能做得更好。要跟大家说的是,这本书只能作为参考,不要完全模仿,因为每个语言都有自己独特的现象,你要按照你所描写的语言的结构和特征去写。比如,R. M. Dixon 写了五六本参考语法,每一本的结构都不一样。他不是按照某一个模式来做的,而是按照各个语言的特征来编写参考语法的。只有这样才能反映那个语言的特点。另外,要尽量写全面的参考语法。要学点类型学,也要尽量记录自然语言;描写所发现的现象。没有什么国外国内之分,傅懋勳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就是参考语法;赵元任先生写的《汉语口语语法》是非常好的参考语法;戴庆厦教授的《景颇语语法》也是比较全面的参考语法;黄布凡教授和周发成先生写的《羌语研究》也是比较全面、比较详细的参考语法。写参考语法的时候,只要注意几点:要全面地、严谨地描写这个语言,另外,最好还要附上词汇表和长篇语料。最近几年出版的一些新书附上词汇表和长篇语料,但有一些描写得不够全面、不够细。我觉得还是要对一个语言做一个比较详细而严谨的描写。还有一点就是,最好摆脱汉语语法和英语语法框架的束缚,否则会制约你的思路。应该从所描写的语言本身入手,用归纳法。当然,也应该多看类型学方面的书,这样你就可以知道更多类型上的可能性,而且还可以帮助你了解所看到的现象。举个例子:比如反身态,当我们在调查一个语言,想了解这个语言如何表达反身态的时候,如果我们完全从汉语或英语的角度出发,这样做容易犯错。第一,因为汉语和英语都用反身代词表达反身意思,所以就会主观性地认为所有的语言表示反身的形式一定是代词。第三,如果所调查的语言有代词的话,那么我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强调代词和反身代词肯定是一样的,因为汉语和英语正好有这样的情况,不区分强调代词和反身代词。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那么在调查

一个语言表达反身意思的时候就会这么问发音人“‘我自己去’这个句子你们的语言怎么说?”问题是这个句子根本不表示反身意思,而是表示强调意思:“是我自己去,而不是别人去。”只有句子里施事者和受事者是同一个所指的时候才算是“反身”意思。比如,“我打自己”是反身的。汉语和英语中,代词既表示反身又表示强调。如果你了解其他的语言的话,就会知道有的语言分强调代词和反身代词两套形式,比如法语。而有的语言,比如俄罗斯语、日语,则是用动词的后缀表示反身意思。这些语言也有代词,但只表示强调,没有反身的作用。我说的要有类型学的知识,是因为有了类型学的知识,我们就会了解有哪些语言现象是可能的,哪些是常见的,哪些是少见的。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知道怎么做调查,同时,在分析语料的时候,可以帮助我们辨识不同的结构。再举个例子,有一次有位同学跟我说,她在分析维吾尔语的时候,一直找不到补语,所以来问我怎么办?跟她讨论这个问题之后才发现原来她所了解的补语是汉语的补语,就是动词后面的一种成分。维吾尔语的动词在句末,动词后没有其他成分,当然找不到像汉语的那一种补语,但这并不意味着维吾尔语没有补语,只是没有汉语的那种补语。因此,我们必须按照本语言的现象来定范畴。再补充一点就是,最好能用自然语料,不要用问卷式的调查。有的时候,语言中有些比较复杂的变化或者是比较少的现象在语料中不容易找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能创造情景来问,但不要用翻译句子的方法去问。

罗自群:您认为,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参考语法方面的研究有何相同或不同之处?国外参考语法的哪些做法值得中国学者借鉴?您能否预测一下参考语法在中国大陆的发展前景?

罗仁地:先回答第一个问题:每个地方都有人写参考语法。香港和台湾做参考语法的人,基本上都是在美国上学学习的,像香港的 Stephen Matthews 教授和 Virginia Yip 教授和台湾的孙天心教授。孙天心教授现在做嘉戎语的参考语法,他的做法和国外的一样,做得很严谨、全面、详细。现在各个地方还是有人在做调查的时候只靠问卷和翻译句子的方法来做。过去我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自己的经验告诉我,最好不要用问卷。现在国外大部分的学者都尽量不用问卷这种方法。问卷问不出真正的自然语言中的现象,反而常常会反映工作语言的范畴和世界观,这样的话就不能了解所调查的语言的真面目。关于你提的第二个问题,哪些地方值得借鉴,主要是全面性和严谨性。你们这里也在做参考语法,但是有时候安排的时间太短,这样要求全面描写就不可能了。在拉筹伯大学我们要求研究生在三年半以内做参考语法,是可以做,要求在这段时间里不做别

的事情而是把全部的时间都投入在研究那个语言中去。他们一般用一年的时间做田野调查(分两段),其他时间都在写参考语法。如果研究者同时还有其他任务,三年半就太短了,六年还差不多,有的人六年还不够。在美国没有时间限制,你当研究生当多少年都可以。我当研究生时当了七年还觉得时间太短。

罗自群:我们现在也在学习国外的做法,让一些博士生,尤其是母语失聪让他们去做参考语法,他们可以集中两三年的时间去。刚才您提到,参考语法有两个角度,一个角度是强调全面性,一个是强调语料的自然性。

罗仁地:还有科学性和详细性。说到角度,我发现有些用英语写的汉语方言的文章,一般都不是从让任何读者都能看懂的角度写的,而是针对懂普通话的读者写的。如果读者不懂普通话,就无法看懂他们写的文章。还有一点很重要,在写参考语法的时候,不能只写那个语言里面有什么现象,还要提到没有的现象。那个语言有的范畴你要写,没有的范畴你也要写。我看一些参考语法的时候,就常常会发现书中没有提到某种范畴,但是我不知道是作者没有提到还是这个语言本身就根本没有这个范畴,所以最好要交代清楚。我在描写羌语的时候,就很注意说明有没有某种标志,某种标志有没有某种用法。这样写的参考语法贡献会比较大。让博士生写参考语法也是很好的,我就是担心时间太短了,不能做全面的描写。现在不是都说要树新风嘛,我认为参考语法上的树新风就是不要急,要慢慢去了解,不要用翻译问卷的方法,要用自然语料。

田小静:最近几年,您主要在从事濒危语言的调查与研究。据我所知,您的“羌语方言调查地图计划”、“独龙、日旺、阿依语田野调查与研究计划”目前已经调查了几十个非常个点的方言。请您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并请您谈谈濒危语言的调查与研究在语言研究中的价值。

#### 四、濒危语言

罗仁地:我一直对羌语感兴趣。我最早申请去做羌语是在1985年,当时我在美国,四川还没开放,没有批准。后来我在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时候,正好有这个计划。1994年何太安先生在所里组织了较大的羌语支调查计划,龚煌城先生、孙天心先生、林英津女士和我,各自选了一个羌语支语言,想弄清楚羌语支是怎么回事。同时台湾中研院展开了东南亚研究计划,使我有机会到缅甸做日旺语。从那以后,这两个语言一直都在同时做。我本来不想同时做两个语言,因为工作量太大,而且这两个语言之间的差别比较大,同时做是比较困难。

的。因为时间有限,进展不快。羌语语法我写了,羌语方言地图还在做。在香港的时候,我申请到一笔比较好的经费,计划做60个方言点,后来因为离开了香港,经费不得不退回,不能用了。在澳大利亚申请经费困难,再者,忙于行政事务和教学,没有足够时间去做调查。最近我集中时间和精力做日旺语的参考语法。我一边做,一边编辞典。我认为,编辞典和参考语法最好同时进行。因为二者关系很密切,要了解词汇,就得了解语法;要了解语法,也得懂得词汇。我打算这次离开北京后,就到缅甸去做调查。资料方面,羌语已经有24个方言点的资料,计划做网站,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到网上,大家都可以用。搜集的目的一方面是作为濒危语言的记录;另一方面,搜集完之后,就可以用方言的资料来做比较。我刚才说的要一层一层地上去,就是想构拟原始羌语,然后构拟原始羌语支,再往上做。我也想构拟日旺语、阿依语、独龙语的共同原始语言。

关于研究濒危语言的价值,首先,我认为所有语言都有价值。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某个语言里可能有我们以前不知道的或者是没人发现过的结构。有的时候,一个新发现的语言可能会改变整个语言学界对所有语言的看法。其次,每个语言都呈现着一种独立的思维方式,是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和划分法。比如,汉语中的“龙虾”和“大虾”都是“虾”,都是一种虾,只是大小不同,可在英语中 lobster, prawn, shrimp 三个不同的词表示三个截然不同的动物。每个社会对世界的认识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社会的语言也是不一样的。当然,还有其他的价值,比如,某个语言可能包含着很多有用的知识,如动植物、医疗知识等。其实,你不了解、没调查过一个语言,就根本不可能知道它对你会有什么用处。另外还有民族象征性的价值。

## 五 田野调查

蒋 颖:您曾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您觉得做好田野调查主要应把握好哪几个方面?

罗仁地:我刚才提到了几点,还有文章专门讨论这些问题(《语言类型学功能语言学派视野下的语言学田野调查》,《语言学论丛》36,2007)。我个人的经验是,田野调查最好靠自然语境中的语料来描写语言、说明问题,而不是靠问卷或工作语言的翻译。我最初做田野调查时,也是使用问卷调查,但后来我发现这个方法有很多问题,因为首先你的问卷都是用“工作语言”来问的,可能根本问不出对象语言的特殊范畴。后来我就改为记录对象语言不同语体的长篇语料,并因此发现了一些仅靠记录单句就无法发现的范畴。例如独龙语,有许多特别的结构就只

在长篇语料中出现,在不同的语体里结构也会有相应的变化;如讲故事就有“故事体”和相关的标志等等。所以,我调查语言时会记录大量的长篇语料。例如,我会请年轻的母语人用本民族语言向他们的长辈提问,问父母辈、祖父母辈某些传统的工具或食品之类的东西怎么做,老人用本族语回答时,我不仅可以记录对话和陈述语料,还可以同时记录下该语言社团的传统文化、历史风俗等具有人类学、社会学价值的知识。词汇调查也同样存在着上面的问题。仅用问卷来回是不可靠的,因为不同语言之间不一定有对等的概念。后来我们采取对着实物或看实物照片来提问的方法,发现了很多各个语言不一致的语义分类。有的概念在汉语或某个语言里是一个词,但在其他语言里可能对应的是两个甚至更多的概念和词,反之亦然。因此,调查词汇时不能有一个先入为主的框架,必须根据该语言的实际情况。否则,就有可能发现不了那个语言的特殊之处。例如“南瓜”在汉语里不分形状、大小等品种的差异,都是一个词“南瓜”。但在英语里根据“南瓜”的特点,就分成了pumpkin、squash等几个不同的词。又如羌语里原来没有抽象概念的“云”,只有具体的不同特点的“云”,如“高山上飘着的云”等。不同语言的词汇所代表的核心概念也不一样。比如汉语有一种车叫“面包车”,这个叫法是因为中国人认为这种车子和中国最常见的面包形状很相似;但在法国,面包最常见的形状是长条形的,所以就不会有也难了解“面包车”的说法了。因此,词汇调查一定要弄清楚每个词的核心概念是什么,应用范围有多大。

胡素华:您刚才谈到了做田野调查时应该注意的问题,主要是针对非母语的学者提出来的,比如被调查的语言与自己的语言中的一些不对等的范畴。我想问的是,作为一名本土的母语人,在做语言田野调查时是不是有不利的方面,比如会不会有些主观?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罗仁地:对,一般来说旁观者清,所以做自己的语言有时会主观。但这也不是问题,只是要多加注意,要录下自然语言的语料,并注意听人家怎么说而不单是注意听内容。大部分人都不会注意自己怎么说或别人是怎么说的,而只注意说话的意思。我自己也在听别人说话或看书、看报纸时,都特别注意别人是怎么使用语言的。做自己的母语,也应该这么做。我知道中国学者很多都是在做自己的母语,虽然做自己的母语,还是要用同样的办法,靠自然的语料,不要完全靠自己主观的直觉。有位说法语的瑞士语言学家,Lambrecht,他在美国上学时发现很多美国人都用一种奇怪的关系子句结构,过后他问那些人“可以这么说吗?”,他们都说“绝对不行,这是不符合语法的!”特别是一些语言学家也是这么说的,他们



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这么说的,录下来给他们自己听后,他们才相信他们是这么说的。就是说研究或学习一种语言,尤其是有文字的语言时,可能有一种 prescriptive(规定的,先验的)的观念,觉得这个语言应该是什么样子,这样的是完全按照自己脑子里的样子,而不是按照真正 descriptive(描述性的,客观的)的方法去描写语言真相。真正是什么样子,还是靠自然的语料是关键。还有你脑子里的范畴,也就是你母语(第一个语言)的范畴,跟别的语言里的范畴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真正的双语人的话,双语就是双文化,就是说脑子里有两个系统,两个不同的思维方式,有两种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方法,可以自由地转换。描写语言的时候要对这两种世界观的区别比较敏感,描写才会客观些。

胡素华:在研究关系子句时,书面语言和口语会有些差别,关系子句在口语里不常用,从自然语料中不容易收集。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会更好一些?

罗仁地:要去了解。如果书面语和口语真的有差别的话,要去记录;两种语体的资料都要收集。一般来说口语句法比较复杂,句子比较多,句子间的关系复杂,可是词组比较简单。书面语则相反,如英语和汉语的科技语体,词组比较复杂,句子的结构简单。

胡素华:如何区分助词、词缀和附属词?

罗仁地:前缀和后缀是跟词根构成一个语法词的,所以首先我们必须对这个语言中的词进行定义,在这个语言里,词是怎么定义的?这个语言里的语法词和语音词不是一回事?如英语的语法词和语音词基本上是一回事,可是,跟藏缅语族语言一样,有附属词(clitic,有人称之为“附缀”),也就是跟词根结合的时候,词根和附属词语音上形成一个词,可是语法上还是两个词。clitic 源于希腊语,是“靠”的意思,clitic 没有独立的 accent,就是靠前面的词,才可以发出音来。词缀是加在词根上的,而附属词是不直接接到中心词词根上而是跟在词组前后的。可以比较英语的两种-s:一个是跟在中心词词根后面表示复数的,比如 the girls who came,这个句子里 girls 是一个语音词,又是一个语法词,-s 这里是个后缀,而另一个是表示领属的标志-s,是接在词组后面,比如 the girl who came's coat,这个句子里 came's 虽然是一个语音词,但是是两个语法词,-s 这里是个附属词。像彝语,是分析性的语言,前缀和后缀不太多,一般都是独立的音节。那么如何区分是助词还是附属词,就看它在语音上是独立的还是靠在另一个语言形式上的。

## 六、藏缅语研究与历史比较语言学

蒋颖:您认为藏缅语的历史演变对历史比较语言学有什么贡献和挑战?

罗仁地:用一般的历史比较法来研究藏缅语,困难是相当大的。因为古老的藏缅语都是单音节的,比较起来困难很大。像南岛语等语系的语言大多是双音节、多音节词,比较起来就相对容易一些。藏缅语如何在这么小的语音形式内进行比较,马提索夫教授就有很好的范例可供参考。他用一般的历史比较法,把缅彝语支的单音节词做了很深入、很严谨的比较。他所提出的亲属关系和所构拟的原始缅彝语比较可靠。印欧语是有形态变化的,亲属关系的比较就在此基础上进行。但汉藏语很难这样做。大部分的词根是单音节的,又没有多少共同形态变化,所以进行比较的基础不如印欧语好。壮侗语和汉语的亲属关系问题存在争议也是因为二者的比较缺乏形态依据,只在词汇上做比较。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找形态来做比较,而且是找一整套形态进行比较。某一个孤例很难说明问题,但有一整套形式来做比较的话,相似的、巧合的可能性就会被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形态很少的语言里,我们可以用一部分形态加上一些特别的词来做比较。例如这次国际汉藏语会议上日本学者池田巧教授就做得很好,他选择了八个没有争议的羌语支语言都有而附近非羌语支语言没有的一套词,把这一套词作为羌语支的特征,然后拿来看有争议的羌语支语言是否有这套词来作为确定其羌语支语言属性的标准,比如,西夏语是不是羌语支语言到现在还有争议,所以池田教授就在西夏语里找一找有没有这套羌语特征的词,后来发现西夏语确实也有这一整套词。这样的比较就比较有说服力,因为整套的东西不容易完全是借的,也不可能偶然或巧合。又如,我为什么说日旺语(Rawang)和奇然提语言(Kiranti)有亲属关系?就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功能上都有这一整套对应的形态,如人称标志、反身后缀以及一些特别的词等等。我们不能说这些都是巧合,通过统计可以发现,Rawang语和Kiranti语都因为巧合而有这一整套同源的语言形式和词汇形式的可能性非常低。有人以为Greenberg的比较是不大可信的,因为其中的结果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是巧合。巧合的可能性要降低到十万分之一,比较的结果才算可信的。因此,对没有形态或形态较少的语言进行比较时,最好找到一整套可比的东西来比较。如果能够整理出这样的一套比较可行的比较方法,也是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贡献。

汪锋:传统的汉藏语的分法一般是藏缅语一边,汉语一边,但现在有学者,比如荷兰的

George van Driem, 就认为汉语更像是藏缅语下的一个语言, 而且他提到了一个在我看来比较严重的问题是, 按照历史比较法的一般做法, 独特的共享创新(unique shared innovation)是做下层分群的一个标准, 但现在似乎并没有人提出这样的创新特征来把藏缅语言放在一起, 而把汉语区分开来。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罗仁地: 对, 我在香港的时候, 有一次 van Driem 到香港来做了一次讲座, 就谈到这个问题。是有些人认为藏语和汉语比较接近。可是, 我认为是一种 bibliographical bias, 因为藏语有比较齐全的词典, 汉语也一样, 所以比较容易找出比较多的同源词, 但是其他的语言没有那么齐全的词典, 就不容易找出那么多同源词。可是他们用的藏文词典, 包括很多藏语的历史层次, 不光是古藏文的。还有汉语也是类似的问题, 汉语的构拟方法也很多, 没有共通的系统, 所以比较的时候就比较麻烦。那次 van Driem 一开始讲就说没有很清楚的同言线(isogloss)来区分藏缅语族和汉语族, 后来他就提出他的那种分法, 把汉语放到藏缅语之下。我说, 你提出以前的分法没有同言线, 好啊, 那你这种分法有同言线吗? 他说, 没有。就是说, 他也没有什么证据来支持他的那种分法。其实说没有共享创新可以用来把汉语区分开来是不对的。语音上汉语方言都可以追溯到四个系列的声母系统, 而藏缅语族语言都可以追溯到两个系列的声母系统。van Driem 原来写了一篇文章, 说因为 Limbu 语和汉语的同源词比较多, 他认为跟汉语有特殊的关系。可是后来马提索夫写了一篇文章, 说这些词语好多藏缅语都有, 并不只是在 Limbu 语中才有, 也就是说没有什么特别。所以, 我认为, 从他的方法出发, 也不能说明他的分法好一点。那么, 如刚才说到的, 我自己就是在确定成套的特点, 一套一套地做, 就是看每一个语支和整个汉藏语系, 看哪一些现象是整个汉藏语系都有, 哪些只有藏缅语才有, 哪些只有汉语才有, 还是只有藏语支才有, 只是羌语支才有, 我在一步一步地做。以前没有人做, 这是比较大的工作。因为我同时还在做其他一些研究, 进展也不是很快, 希望将来和其他人一起来做这个工作。

汪 锋: 就是像上次我们语言学沙龙谈到的那样, 现在可能更需要的是做更多下层的基础工作, 不然大家都是没有证据, 争论就没有意义。我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做白语研究的时候发现有些争论是以藏缅语 VS 汉语的分类结构为前提的, 有人认为白语属于藏缅语, 有人认为与汉语近, 如果这个结构变了, 比如, 汉语成为藏缅语下的一支, 那么这个争论就没有意义了。

罗仁地: 现在我认为汉藏语应该分藏缅语族和汉语族。如果以后有更详细的资料, 或许

会改变我的想法。像张琨教授就一直不接受汉藏语系这个想法。所以，还是有人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自己觉得，如果做了详细地比较就会很清楚，可是，大家现在争来争去没有多大意思。

汪? 锋：是。我担心的是我们研究的问题是否是个假问题，比如，刚才说的白语是藏缅语的还是汉语一边的问题，费了很大劲儿地去证明，事实上，这个假设的前提可能就很危险，很不可靠，所以不如去做更具体的语言比较，找到语言之间词汇、语法的关系，等等，或许更有意义。但人们还是很喜欢讨论这个语系和那个语系有怎样的关系之类的问题。

罗仁地：对。像“汉语是一个语言”也是个前提。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以前没有多少人去做比较深入的方言研究，只用一个统一的字表来研究发音的差别。其实方言的差别比较大。我们应该作比较深入的研究。像李方桂教授说的，如果你要了解壮侗语和汉语的关系，你需要先弄清汉语是什么，壮侗语是什么。

汪? 锋：是，划定一定的范围或许是个办法。比如说，汉代的文献代表的汉语。如果比较的时候从某个字典里找几个词，说这个跟壮侗语什么的相似，然后说汉语跟它们的关系，其实需要一个前提，这个字典里的词是汉语的成分。很少有人比较的时候把这作为一个问题。许思来 (Axél Schuessler) 在 *CLL 34.1* (中国语言学报) 上有一篇文章 (Multiple Origins of the Old Chinese Lexicon) 说汉语中同义词特别多，如果真的都是一个语言的成分，就有些难以理解，为什么同样的意思需要用那么多形式来表达？可能很多是从其他的语言来的，只是用汉字记下来，实际很少用。

罗仁地：我前天在北京论坛做的一个报告就是说，汉藏语系从殷代开始到现在有大量的民族迁徙、民族接触，有很多的“波浪”。迁徙的时候每到某一个地方就跟另外一个民族接触，就像你刚才说的，闽语、粤语等肯定受了其他民族语言，像壮侗语、南亚语等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是壮侗语受了汉语的影响，还是汉语受了壮侗语的影响？我经常提到的一个例子是越南语：越南北部原来在中国的统治之下，那时候越南语受到了汉语很深的影响，可是到10世纪越南独立了，然后就有自己的发展。但如果没有独立，越南语到现在一直受汉语同化影响的话，现在很可能我们都会认为越南语是汉语的一种方言。

汪? 锋：对。我同意你的看法。在越南独立之前，越南语深受汉语影响，但独立之后，越南语就发展出了自己的特点。这跟壮侗语和汉语的关系有点像。我们研究的时候，应该先搞清楚语言之间的实际关系，而不是先去争论它们属于哪个语系。

罗仁地：我也同意。我觉得，在研究语言关系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关注具体的语言现象，比如词汇、语法、音韵的对比，而不是先去争论一个大的理论问题。只有当我们对具体的语言现象有了深入的了解，我们才能对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更合理的解释。